

林语堂



散文选集

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林语堂散文选集

纪秀荣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林语堂散文选集/纪秀荣编. —3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6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58—6

I. 林... II. 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86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7.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纪秀荣

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一八九五年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漳州府平和县）的坂仔村。父亲是个乡村牧师，为人热情爽快，机智幽默。他常爱给孩子们讲笑话，把他们逗得大笑不止。幼年的林语堂深受父亲幽默气质的感染。

林语堂六岁启蒙，由父亲在家教念诗、经书和古文。十岁，林语堂到鼓浪屿教会小学上学。

一九〇八年，林语堂入厦门寻源书院。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他接触到西洋音乐，简直着了迷。还以一名基督教学校学生的身份参观了美国舰队，感受到西方进步的科学和技术威力，刺激了

他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一九一二年他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英文。热情甚高，竟全部停止对中文的研究。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在清华学校当了三年英文教员，此时他感到大学期间中文学习的荒疏，又继续读了大量古文和古典小说。广泛的涉猎，为他以后的散文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九一九年，林语堂携新婚的妻子廖翠凤踏上出国的旅程，先后去美国的哈佛大学、德国的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留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林语堂受到欧美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的影响，读了哥德、莎士比亚、海涅等外国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对英国随笔的幽默和从容风格十分欣赏。这些对林语堂后来的政治观、文艺观和散文风格的建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林语堂同妻子登轮回国，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教授。这年冬天，林语堂陆续写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最先提出把英文 *humour* 译成幽默，并提倡幽默，但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一九二四年，林语堂参加了以鲁迅为

发起人之一的语丝社，成为《语丝》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之一。《语丝》以杂文为主，注重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林语堂与鲁迅等语丝同人在对章士钊、研究系、现代评论派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并肩携手、相互支援。共同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①的“语丝文体”。后来，林语堂把《语丝》时期所写的文章结为《剪拂集》出版，展现了林语堂“浮躁凌厉”时代的战斗风貌。

一九二六年，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段祺瑞下野，政权落入另一军阀头子张宗昌手里，反动军阀残酷迫害进步知识分子，鲁迅、林语堂都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内。五月，林语堂南下厦门，鲁迅为之送行。林语堂在厦大任教授、文科主任，并推动校方聘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等来厦大执教。此间，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一九二七年，林语堂带着“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的梦想，应陈友仁之邀到武汉政

① 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府任外交部秘书。六个月的秘书生活，他目睹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公开叛变革命，原有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对革命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他感慨于自己“少不更事的勇气”，“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再也唤不起当年与旧军阀斗争时的意气，只是充满了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这种思想上的倒退，使得林语堂与鲁迅二人产生了根本分歧，以至最后分道扬镳。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三年时间里，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1932）、《人间世》（1934）和《宇宙风》（1935）三种小品文半月刊，打着“幽默”的大旗，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①，以“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②。出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林语堂办的刊物上既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些左翼作家和著名政治活动家如宋庆龄、何香凝的作品，也登载过反共文章和嘲弄

① 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第1期，1934年4月出版。

② 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人间世》第6期，1934年6月出版。

马列主义、讽刺左翼文学的文章。林语堂这时期写下大量散文，多发表在他自己主办的三种刊物上，后收集在《大荒集》、《我的话》（《行素集》、《披荆集》）、《进行集》、《有不为斋文集》里。林语堂的散文，有些是把讽刺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当权者和他们的反动政策，有些是嘲讽左翼文学，而大量的是游戏消闲、轻松闲适的戏谑小品。鲁迅为了坚持“五四”以后的战斗传统，使小品文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对林语堂的主张作了深刻的批评。认为林语堂的幽默，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①的闲适小品，将“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②。明确提出小品文“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③而非“‘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鲁迅这些批评在当时具有醒世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林语堂移居美国从事英文著述，最初到美国时，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发表，谈他在国外的生活和见闻。后专用英

① 《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②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③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文写作，有著作三十六种，其中小说、文学传记十种，散文、杂文集九种，中国文学英译本七种，编、著学术著作十种。林语堂广博的知识，操英文写作之流利俏皮，使他的作品大受欢迎。《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印行了四十版以上，林语堂获得了“文化人中之龙凤”^①的盛誉，在国际文坛上产生了影响。

一九四七年，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长，带全家游历欧美各国。一九六五年应台湾中央社社长马星野之邀，撰写《无所不谈》专栏，四年间，用中文断断续续写了一百八十多篇，后结集为《无所不谈合集》在台湾出版。一九六六年六月，林语堂自美返台定居，居室在台北近郊阳明山麓，与家乡彰州遥遥相望，勾起了缕缕思乡之情，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抒情散文。移居国外或在台湾居住时期的林语堂，始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很大隔膜。《无所不谈合集》内，有谩骂革命领袖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章，表现了他政治上的反动立

① 林语堂自传《八十自叙》。

场。他的后期散文，大多论古人之幽默，谈生活之享受和归隐山林之逸趣，完全是一副沦落的封建士大夫面目。一九六七年，林语堂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当代汉英词典》的编译，于一九七二年完成。一九七五年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结果落选。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复杂的、有争议的作家。林语堂的散文，在内容上有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特点，除其明显的政治上和观点上的差错外，他的有些思想和主张，如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等等，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特别是联系林语堂个人后来发生的变化，既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历史的局限性，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反动的阶级实质。

—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基本经历了三个时期：《语

丝》时期(1924—1926),《论语》——《宇宙风》时期(1932—1936)和《无所不谈》时期(1965—1968),这三个时期记录了作者思想变化的历程。若想了解林语堂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和文艺主张,他的散文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与北洋军阀研究系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是林语堂语丝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九二三年归国的林语堂,接受了欧美文化思想的核心——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政治,认为“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①,而反动北洋军阀残杀爱国学生的暴虐行为,覆没了他的理想,激起他强烈的义愤。他毅然决然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当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是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执行者之一。现代评论派为章士钊涂脂抹粉,并指责以鲁迅为代表反对章士钊的进步师生是“匪”。为此,林语堂写《祝土匪》与其针锋相对。他正言宣布,我们情愿“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也不作专制暴君的俳优;时代需

^①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选自《剪拂集》。

要土匪”，“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打狗释疑》也表现了这一内容。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是这时期林语堂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第三天，林语堂就写下了郁愤情深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刘和珍是林语堂喜爱的学生，她无辜之死引起林语堂心灵的颤动，他按捺着千般悲痛，万般愤怒，再现了烈士生前的音容笑貌。以美的毁灭，激起人们对刽子手的痛恨，而更加钦佩烈士英勇无畏的胆魄、谦逊优美的人格、忧国爱国的情怀。作者深切写到，“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这种对遇难烈士所表现的深切同情，是林语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在淋漓的鲜血面前，林语堂没有被吓倒，反而剴切表示：“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

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这种与黑暗社会势不两立的态度，对林语堂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探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是林语堂《语丝》时期散文的一个基本命题。《致玄同先生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等文章都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认为，“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所以有“欧化精神”的必要，“精神复兴”是最为迫切的工作。他推崇法国大革命，企图用西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那种积极进取精神来克服民族的卑琐、懒惰等劣根性，以达到救国的目的。于是提出“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愤、卑怯、颓唐，傲惰之痼疽”的六个条件。林语堂当时虽然没有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推翻反动统治，因为这种民族劣根性正是长期封建统治的“治绩”，而从思想革命入手来救国比科学救国等思想要进步多了，在当时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林语堂的进步性还在于他对人民变革现实斗争的高度赞扬。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

动爆发之后，上层阶级的老爷绅士们害怕人民的力量，千方百计地诋毁和歪曲这场运动。为驳斥丁文江之流，林语堂写了《丁在君的高调》，文章说到：“本人不是要驳丁先生的，因为明白这回全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的人，不必有人来启导他。若是不明白这回运动的真正意义的人，若丁在君与其同辈，不明白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并以对待民众态度不同，划分为两个阵营，“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表明了林语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

《语丝》时期，是林语堂政治上的“黄金时代”（胡风语）。然而仍暴露了他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构成了他进步思想中的阴影。周作人曾在《语丝》上提出“费厄泼赖”（fair play）主张，意即对失败者应予同情。林语堂表示赞赏，在《论语丝文体》中强调：“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这说明林语堂的思想是很混乱的，后来在鲁迅的批评和帮助下，林语堂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写了《打

狗释疑》，同意鲁迅“痛打落水狗”的观点。但这阴影并未消除，在以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反而扩大了。

林语堂政治上的倒退，是发生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之中，往日轰轰烈烈的革命处于低潮，这对林语堂是个不小的打击。此时革命阵营的分化，对林语堂更是强烈的刺激。本来思想基础并不深厚的林语堂这时产生了失望和苦闷情绪。《剪拂集序》集中反映了林语堂当时的茫然和消极。“我唯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他把自己的“浮躁凌厉”看作是“少不更事”的举动，那么长进见识的林语堂又怎样呢？他劝告青年：“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大祸当头，识时务为俊杰，“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仅与“三·一八”惨案相隔三年，林语堂的态度已判若二人。林语堂的这种变化，看起来有些突

兀，其实是合乎林语堂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因为林语堂不满现实，支持爱国学生，只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并不是基于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正确的认识。林语堂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只是这种思想在革命高潮时处于次要地位，在革命低潮时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林语堂的这种思想在创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过程中有更充分的表现。林语堂是在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状态下创办《论语》的。一方面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一方面又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所以他打出“幽默”的旗号，想走一条中间道路。《论语》初创时期，对现实不乏针砭，鲁迅曾给《论语》投稿，想把《论语》拉过来。林语堂这时期也确实写了不少讽刺国民党昏庸统治的文章。如《论言论自由》、《论政治病》等。《谈言论自由》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他先说人与兽的区别，兽只会叫，不会像人能说出“你危害民国”的讨厌话，所以人不如兽自由。“猫叫春是非常自由，而